

■对 话

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：

艾平：展现风景中的生态秘语

□张昊月

对自然的认知还在进行时

张昊月：在阅读《天生草原》的过程中，随着您的步履所至，笔触所至，我不时会不由自主赞叹：您真是一个勇敢的人！您常常独自游走在草原上，或者森林里，请您讲一讲这样做的缘由吧。

艾平：多年来我渐渐地把采风之行变成了行走，我和25万平方公里草原森林中的植物、动物，产生了同呼吸共命运般的亲近。每一天我都要默默地和它们对话，向它们讨教生存的微言大义。一位学狼豪救助母狼和幼崽的阿妈，一位为了守护3000亩野生赤芍遇险献出生命的青年，草原上的一种小草、森林中的一片黄叶，一头闯入人类领地的小鹿、一组残缺的轮枝、一根长满苔藓和蘑菇的外生菌根、一段斑驳爆裂的树皮，都会让我产生亲切和好奇，每每穷究，每每口诵心惟，继而便不停地化作力量，驱动我一次次远行。

张昊月：您的散文里写了很多植物，像白桦、落叶松、会飞的樟子松、白雪森林等；写了很多动物，有驯鹿、狍子、驼鹿、雪鸮、黑嘴松鸡等。您通过哪些途径认识它们，了解它们？它们和人类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现实关系？

艾平：我观察植物一般都是直接进入原生态地界，请当地专业人员引导讲解。还会在不同的季节再去一次，看看草木的变化，我会习惯地把手伸进地面的腐殖质层中，感受温度和湿度，从而反观植物的生长。对于一些大型的野生动物，我采取灵活的方式反复观察研究，一般是偶遇或者蹲守，还要进入博物馆再度观察。比如驯鹿，我就两次到俄罗斯斯塔和乌兰乌德的博物馆看标本，研究驯鹿身上的细微之处。我在《姥爷的犴》一文中对这种动物有细致的描写。现在，在北部原始林区，一些人常常一厢情愿地投喂动物，动物就坐在马路边上等汽车。曾有一只棕熊带着它的幼崽到人类开放的院子觅食，进入了储备食品的车厢，吃了应急救火部队上的食物不说，还喝了白酒，醉得呼呼大睡，醒来之后，毫无惧色地离去。它貌似不会伤人，可当人们进入森林去采僵松籽的时候，棕熊动怒伤人，因为熊是靠吃僵松籽囤积脂肪冬眠的，它认为你进入了它的觅食领地。

草原和森林的生态秘语，越是观察，越是无穷无尽，我想自己活到老学到老，也只能略

知一二。

张昊月：对草原和森林的观察和沉思，和您的阅历有一定关系吧。您长期生活在以草原驰名天下的呼伦贝尔，呼伦贝尔草原的邻居就是大兴安岭，您也常常出入其间。您能给我们讲一讲您和呼伦贝尔草原、大兴安岭的故事吗？

艾平：讲个小故事吧。有一天，我和朋友从额尔古纳湿地边的公路走过，不断看到有许多水鸟飞过，就停下车走近观察。突然见到草丛中飞起一对蓑羽鹤，飞得很低，贴着草尖蹒跚起舞，舞姿千变万化，非常好看。我们就沿着路面跟着它移动脚步，它们好像充满激情，一直跳出去有100多米，然后高高地飞走了。一个熟悉草原的朋友说，我们下去看看，附近一定有情况。我们进入草丛，果然发现了蓑羽鹤跳舞的起点位置有个鸟窝。一看，鸟窝是空的。再仔细看，发现有些不一样，原来地面上有3只小鹤，它们把身子铺平，像一张和泥土同色的纸，隐藏在地表面。见我们走近鸟窝，两只大鹤就扑啦啦地飞回来，一副要和我们决斗的架势。我们赶紧回到公路上，蓑羽鹤的鸟窝平静了，草浪涌动，我又被上了一堂生态课。不久前，我在草原的一堆碎石头中驻足，突然听到一只百灵在我头上凄厉地鸣叫。这一次我有了经验，低头一看，碎石堆上有4只百灵鸟的蛋，竟然和石头一个颜色。正是大自然塑造了万物，万物皆有神灵和智慧支撑生命。

带着梦想和爱写生活

张昊月：在您看来，人和草原的关系、人和森林的关系，这些年间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？这种变化对当地人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？它们又怎样影响着您的文学态度和文字表达？

艾平：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了。牧民的草场都加了铁丝网，在草场免于碾压破坏的同时，牛羊被局域化饲养，不能通过皮毛粘贴传播草籽，牛羊食物的丰富性也减弱。不少人变得趋利，传统文化中的包容和互助在退步。而科技面向牧业生产，又让牧民探索着新的经营模式，不可否认的是草原生态保护成了人们的共识。

在森林中，狩猎民族在20多年前已经放下猎枪，大兴安岭森林全线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，林业工人由伐木者变成了护林人，森林生态得到全面恢复。呼伦贝尔人对森林的珍惜眷恋从未改

变，狩猎文化在旅游经营中得以传播。我2021年6月到敖鲁古雅鄂温克使鹿部落参加玛丽亚·索老人孙女的婚礼，玛丽亚·索老人是鄂温克使鹿部落最后的酋长，当时已近百岁，她叮嘱孙女的话只有一句——别忘了林子的味道。

我用地者的眼光看森林、看草原、看世界和时代对这块隐秘之地注入的力量，看其中文化间的冲撞和融合乃至提升。这一切都显现在人物的身上，贯穿在每个人物的成长和行动之中。很多人把草原书写成宁静的田园，然而在波澜起伏的时代变迁里，人的彷徨、失落、新生，才是文学创作需要洞察和跟踪的。我愿意更多地书写“变”带来的撕裂，也捕捉“变”中不曾断裂的精神根



脉——草原民族敬畏天地、善待生灵的信念，始终没有消散。

张昊月：您的作品刻画了不少草原民众，像萨丽娃姐姐、达喜老哥哥、呼和勒阿哈、锯羊角的额吉等，每个人的故事都令人难忘，读来似乎又有着相似的生命底色。您将草原人生写得如此出彩的诀窍是什么？

艾平：我在草原、森林有很多朋友，有做了一辈子马鞍的巴特尔老哥哥，有多位肯告诉我她们心事的草原额吉，也有像赵红松那样重回草原创业的国家特级导游……多年来我与他们休戚

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：

江非：自然不是滤镜，是抵达人之本真的存在之路

□本报记者 杨茹涵

诗是对“是”的一个发现

记者：江非老师您好，祝贺您的诗集《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》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。这本诗集收录您跨度25年的140首诗作，新作与早年代表作并存，集中呈现您20余年的写作沉淀。这次获奖于您而言，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？

江非：这本诗集集中体现了我对“人与自然天性”这一主题的思考与书写。它与“人与自然”“人与个人史”“人与普遍史”等主题一道，构成了我个人诗歌书写的体系框架。诗集能够获得奖，我想或许是评委对这种诗学现象的一种肯定吧。这让我不断回想起小时候随家人一同去耕种与收割的“田地”，想起那个少年独自走入其中游荡的“田野”，想起被邻人乡亲视为生命的“土地”，还有我眺望苍生的“大地”，以及思索人类行迹的“地球”。这些关于“大地”的不同意象与概念，作为根基始终支撑着我的写作，让我面向自我、人类历史、自然与存在，在诗歌中呼唤生命的本真应答。

记者：您的人生足迹从山东平墩湖辗转临沂，再到海南澄迈、海口，历经地域与内心的多重迁徙。在漫长的写作生涯里，您对“诗歌究竟是什么”的理解，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？

江非：我对诗歌的总体观念发生了多次变化，而每一阶段指导具体写作的简要理论更是五花八门，其中既有对也有错，既有重复又有新的思考。但这些认识，无疑作为必要的理论，直接指导了我每一阶段的诗歌写作。2008年前后，根据自身的写作感悟，我将自己的诗歌观点总结为一句话：诗是对“是”的一个发现，以及对先验逻辑的重新映照。对我个人而言，这句话基本从形式、内容、发生、表达等各个方面概括了我对诗歌的全部理解。我认为，人类全部的语言、知识、思想与历史的创造，其实就是对“能”“是”“有”“在”这四个基本范畴的摸索。诗歌属于“有”的范畴，它从“在”的范畴中提取问题，向“是”的范畴回归，以求获得解决的能量与方法——这是一个人类语言行为。它的音乐性与节奏性，所呼应的正是先验逻辑对人的思维时间的分割与协调。这个观念至今仍一直指导着我对诗歌的具体认识，也成为



江非

为我个人诗歌思考与写作的最高理论依据。

抵达自然与人之关系的本质层面

记者：评论界将您定位为“自然主义”代表诗人，但您笔下的“自然”似乎有别于传统田园诗的浪漫化书写。您在《卖秋收的人》《表舅来访》中呈现的是“去滤镜”的乡村，甚至带有某种粗粝和艰辛。您如何看待“自然主义”这个标签？

江非：“自然主义”一直是我的基本认知方法，也贯穿于我的诗歌写作之中。正因如此，大家在我的一些诗歌中看到的那些人与事，往往既不浪漫，也不悲苦，大多是在一种“自然”的智慧与态度中，平静地度过自己的时间——甚至这种生命的“度过”本身，也与时间平向而行。

这也影响了我在诗歌中对“自然”的理解。我认为，诗歌中所写到的“自然”，其根本属性其实关

乎一种带有存在启示意味的绝对死亡。诗歌中的“自然”，包含对“自然之是”的发现与对“自然之事”的描述，进而指向人的“自然之心”与“自然之言”。这是我认为考察诗歌中“自然”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标志，也是我所理解的诗歌中的“自然主义”。

记者：我注意到您诗中有大量关于“工具”的凝视——《割草机的用途》中“它和草的关系，即它是割草机，而草是草”《削土豆的人》中对一把刀的端详，《劈柴的那个人还在劈柴》中父亲抡起斧子的场景，赋予了这些寻常农具、日常器物厚重的哲学意蕴，您为何会持续聚焦这些不起眼的劳作之物？透过工具与劳动者的相处，您想探讨怎样关于大地、劳作与人的存在命题？

江非：对“工具”的凝视，其实正是对人的凝视。工具与人的劳作密不可分，工具与人的相处，是最为普遍的生命事件。人借助工具成就自



江非

身的劳绩，并由此获得被开拓的生命时间。作为人的生命、渴望与能力的延伸，那些工具在与人类共同劳作的过程中，也同时展开了人的形象。当然，于我而言，这些出现在诗歌中的工具与农具，不仅仅指向人的生命形象，我还渴望在它们与人的协作关系中，揭示出我个人对世界的某些看法。因此，写作时，我尽量将它们塑造为“事件”，让它们具备拉奥孔式的悲剧性与崇高感。一个



艾平

与共，共同经历生活的跌宕起伏，真挚的感情不是通过一两次采访形成的。相处越久，理解越深，我常常是站在他们的位置，带着他们的梦想和爱好来写他们的。

张昊月：您的作品在许多读者和评论家眼里，是当代生态文学的代表性作品。您对生态文学有过什么样的思考？您认为生态文学对生态建设又会有哪些影响？

艾平：我们的某些作品，眼光往往停留在物态的表层，或简单地去科普自然常识，或低吟风花雪月，或猎奇以闻达。在我看来，自然文学的自然二字，只是个有关创作题材的定语，主语依然是文学。没有探讨被自然孕育、哺育、生成、更改、异化、制服、回望，没有不断思考、历经挣扎而后升华的人类精神活动，文学就失去了生命。辽阔的草原和浩瀚的森林，就是活生生的自然博物馆，而与之不可分割的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，乃是天人合一的硕果。这块土地上的民风民俗、生产生活、宗教观念、审美理想，无不吸纳了由来

已久的、没有被哪个作家清晰地写出来的人文与生态观。在这里，每一个有准备的写作者都会有目不暇接的收获。我会使用在地者和写作者的双重眼光，看世界和时代对这块隐秘之地注入的力量，看其中文化间的冲撞和融合乃至提升。

我们国家生态文化建设正处于进行时，文学是其中一种走向大众心灵的方式。好的生态文学作品甚至比教科书更有深度和力量，关键是要把天地人文和人类情感融为一体有温度的整体，栩栩如生地写出来。

关注草原和森林的时代之变

张昊月：您的作品从选材到表达手法，都有极强的辨识度。可否谈谈您的创作理念？

艾平：说一句老话，文学作品的形式是由其表达的内容所决定的，对于我来说文体的创新是自然的、必须的。有的时候需要揣摩出动物的生命体验，我就让驯鹿成为叙述者，于是有了《驯鹿之语》；有的时候需要探寻植物的生命历程，于是有了使用第二人称的《会飞的樟子松》；有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有故事的人，他的讲述中自带在地者的性格语言和感情，于是就有了《阿哈的金牌》这样的文体。

张昊月：您在《哈拉海进城》一文中，谈到您用哈拉海成功试验出两种举世无双的佳肴。无论在山林草原的孤身探险、烟火生活里的大胆尝试，还是在散文创作中的文体实验，您总显得非同寻常。怎么做到这一点？

艾平：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呼伦贝尔人，吃牛羊肉喝牛奶长大，大地上的菌类、野菜、野果也给予了我丰富的营养。我读了一点书，便按捺不住，常常心血来潮，搞点小实验，“作品”好吃不好吃另论，但哈拉海炒毛豆加土豆丁、哈拉海羊肉饺子，肯定举世无双。还有我用蓝果忍冬、东北茶藨子酿制的果酒，令人回味无穷。至于散文写作，也像我的食物实验一样，就是不愿意陷入被设定的窠臼，也不愿意总是重复自己。除了一些应景的短文，我一直在实验和寻找，我要找到的并不是最终的完美，而是让表达得心应手。

张昊月：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？

艾平：我会更多地关注草原和森林的时代之变，书写一些令人深思的课题，写世风之中人的进退和求索，不拘于使用散文的方式。

词语化游戏。

记者：在算法统治、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您是否认为诗歌承担着某种“时间修复”的功能？

江非：这些年来，促使我始终坚持写诗的，很大程度上并非那些流变之物，而是那些恒常不变的事物。对于一个作家或诗人来说，我们现在所体验到的，与我们五千年前的祖先所体验到的，并无本质差别——无非是生死、劳作、时间与思索，不同的只是每个作家从同样的经验中抽取出的那个独特之物。但我也相信，重复即差异。文学的使命之一，正是以重复中的差异来对抗经验的匮乏。这种重复中的差异性，让生命获得了尊严，并超越了时间的自然属性，从而让生命具有了独特的历史性。

至于在算法统治、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，是否能承担“时间修复”的职能，这个问题我尚未深思。我只能说，诗歌因其精神特性，能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时间感受，或许诗歌中这种“综合”了多重时间的状态，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我们时代时间感的匮乏吧。

记者：整本诗集善于从寻常生活事件里挖掘存在本质，还塑造出循环往复、充满仪式感的时空表达。能否谈谈您是如何通过诗歌重构时间的？

江非：坚持诗歌写作这么多年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点：第一，是人对生命本身所怀有的探求欲与爱；第二，是对生命在时间中展开的各种形态所抱有的历史性关注；第三，是对人类现实与所处时代自发承担的理解与言说之责。简而言之，便是对隐秘与未知的迷恋与追问，对时间、快乐与痛苦之根源的不断挖掘。

我认为，诗歌应当是对各种世界关系的确认与求证，但它的努力方向截然相反，不是让这些关系更为明确、清晰，而是让它们变得更加模糊、错杂。就其生成机制而言，诗歌实则是一种辩证法。诗人里尔克曾说，诗歌就是经验，而他紧接着补充：经验就是回忆。对我个人而言，诗歌正是扎根于过去而面向未来的。在诗歌中，“我”活在地球上，“我”在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人类之中呼吸。我所面对的唯一现实是生死、劳作、时间与思索。正因如此，诗歌的笔触需要深入那些空间的反面与时间的罅隙之中，去创造一种新的时间，赋予那些平凡之处、幽微之处以独特的时态。